

元儒趙汭的遊學、思想特色及其治學歷程*

吳兆豐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前言

趙汭(1319–1369)，字子常，號東山，安徽休寧人，是元末明初知名的儒者，清修《明史》有傳，¹當代的《明代名人傳》也有他的個人傳記。²明代士大夫多視他為受明太祖之詔纂修《元史》而不仕的儒者，³明末清初士人議論他是不仕新朝的元遺民，⁴當代學人對他不仕的現象和原因也有討論。⁵他的〈對問江右六君子策〉提出朱、陸之

* 本文承蒙業師朱鴻林教授指導和斧正，特此致謝。此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獨立審查人賜予的寶貴意見，也為本文添色不少，謹此一併感謝。

¹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八二〈儒林傳〉，頁7226–27。

² 見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25–28，趙汭傳由 John D. Langlois, Jr. 撰寫。

³ 彭澤、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弘治刻本（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卷七〈人物·儒碩〉，頁四七下至四八上；焦竑：《國朝獻徵錄》，《明代傳記叢刊》本（臺灣：明文書局，1991年），第114冊，頁716–21；朱國禎：《皇明開國臣傳》，《明代傳記叢刊》本，第26冊，頁288–92。

⁴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明代傳記叢刊》本，第11冊，頁134；查繼佐：《罪惟錄》，《明代傳記叢刊》本，第85冊，頁261；顧嗣立：《元詩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二集，卷二四，頁一上至一下。又，清初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未著錄趙汭的學行，黃氏門人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把趙汭收錄在〈草廬學案〉，視他為吳澄之同調黃澤的門人，稱趙汭為「隱君」。見全祖望：《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九二，頁3084。

⁵ 錢穆認為元末明初的士人，不忘故主，依戀元室，對明建國並無華夏重光之歡愉，趙汭也是一例。見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續編·讀趙汭〈東山存稿〉〉，載所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76–89。劉祥光認為徽州文人以道自任，道統作為安身立命的自主性是獨立於政治之外的。見劉祥光：〈從徽州文人的隱與仕看元末明初的忠節與隱逸〉，《大陸雜誌》第94卷第1期（1997年1月），頁32–48。

學「早異晚同」，這論調不僅為當時和後世學者重視，治宋明學術思想史者也予廣泛關注。⁶

趙汭致力於《春秋》學研究，研撰豐碩。因為他在《春秋》學上取得的成績，明中期他被祀奉於徽州府及休寧縣鄉賢祠，⁷明末的錢謙益（1582–1664）稱許他「度越漢宋諸儒，當為本朝儒林第一」。⁸清修《四庫全書》全文著錄趙汭五種《春秋》學著作，數量之多是《四庫全書》著錄《春秋》學著作中之最，⁹可見清人對其成績的肯定。新近的研究既評論趙汭的《春秋》學，也分析他重要的《春秋》學著作，顯示了當今學界對他《春秋》學的重新認識。¹⁰

有關趙汭的研究可謂豐富，但他作為元末學術思想史上重要和代表的儒者形象卻並未突顯，至於他的思想主張和特色更少有論及。他早年四處遊學的經歷，未盡為今人所知，更欠缺探析他輾轉遊學的原因和對型塑他思想特色的影響。〈對問江右六君子策〉的核心論調為世所知，卻未能把它置於趙汭特定的治學階段和思想主張的背景下來進行分析，導致其真實意涵不得彰顯。他學古明經，以研究《春秋》學終其餘生，其平生志事已為研究者熟知，但對他抱負所在的經典研究的動力源泉和所折射出元代朱子學的特色卻少有論析，至於他一系列《春秋》學著作的成書過程以及他如何努力克服面對的困難，也不盡為今人所知。本文以趙汭的遊學、思想特色及治學歷程為中心，重點探析其思想主張和特色與他處身的徽州學術環境的關係，及其平

⁶ 明人程敏政和會朱、陸的思想便是受趙汭的影響，請參看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頁34–44。有關趙汭和會朱陸的思想及其對後世的影響，新近的研究有：解光宇：〈徽人關於「朱、陸異同」的對立及其影響〉，《安徽史學》2002年第2期，頁23–26；白百伶：〈宋元之際朱陸異同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頁100–106；徐遠和：《理學與元代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96–214。

⁷ 汪尚寧：《〔嘉靖〕徽州府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嘉靖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卷一〇〈祀典〉，頁三下至四下。

⁸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134。

⁹ 《四庫全書》收錄趙汭五種《春秋》學著作：《春秋集傳》、《春秋師說》、《春秋左氏傳補注》、《春秋金鎖匙》、《春秋屬辭》。按：有種種證據表明《春秋金鎖匙》並非趙汭所撰，筆者將另文論說。

¹⁰ 關於趙汭《春秋》學的討論參看：周曉光：〈論新安理學家趙汭的《春秋》學說〉，《安徽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頁463–71；張高評：〈黃澤論《春秋》筆法——《春秋師說》初探〉，載楊晉龍（主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下冊，頁579–623；涂茂奇：〈趙汭及其《春秋》學研究〉（臺北：東吳大學碩士論文，2000年）；黃開國：〈趙汭的《春秋》學〉，《中國哲學史》2004年第2期，頁85–91。葉天賜〈元代徽州朱子學研究——以鄭玉和趙汭為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簡析趙汭和鄭玉的儒學思想包括宇宙論、心性論和融會朱陸論，以及他們研究《春秋》學的方法和闡發的微旨。

生志事的時代意涵。希望借助這一研究，豐富我們了解趙汭在元末思想界的形象和位置，為進一步探析元末思想界尤其是徽州朱子學的動向有所補益。

輾轉各地的遊學與交遊

徽州是朱子故鄉，學術皆以朱子學為歸。¹¹徽州雖沒有出現如許衡、吳澄、許謙那樣著名的儒者，但也碩儒輩出，自成風氣。¹²趙汭生長於徽州，中年之前輾轉安徽徽州、浙江淳安和杭州、江西九江和臨川等地，四處遊學，廣接師友，相比於其他徽州學者多在本地求學為教，他的經歷無疑顯得異乎尋常。其中的原因，其實與徽州朱子學發展流弊的學術背景有關。實際上，趙汭早年的遊學經歷，是他追尋為學之方的過程，還使他有異乎時人的思想特色。

趙汭得以四處遊學緣於他家資充裕。趙汭的祖父趙彌孝是南宋浦江稅官，入元後為休寧縣丞，遷婺源州丞，朝京得授杭州仁和縣令，未至而卒。¹³至正十三年（1353），徽州亂而復平，趙汭感嘆「遭此厄運」，追溯家世說：「當其盛時，資產擅一鄉，家學以儒名，在官為命士，而喪祭之儀通乎禮俗。」¹⁴趙家在鄉里的地位由此可見。趙彌孝還結交了一些以道學自命的故宋儒士如許月卿（1217–1286）、胡次焱（1229–1306）等，他們「杜門賦詠，鍛苦煉枯，淒斷淪絕，以寄其沒世無涯之悲」，但皆學宗朱子，氣節凜然。趙汭與這些儒士結緣，得以遍覽他們的文字翰墨，且有「生晚不見前輩」之恨。¹⁵

故宋遺民對趙汭的影響，還體現在他冠年之前的師承上。他曾離開休寧，從遊於婺源的汪炎昶（1261–1338）。宋亡，汪炎昶年僅十六七歲，但從故宋遺民孫嵩遊

¹¹ 趙汭：〈商山書院學田記〉，載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54冊，頁515。本文參引《全元文》，但皆與《四庫全書》本《東山存稿》比勘校對，不另行交代。

¹² 過往的研究除通論元代朱子學的發展概況，多側重討論北方學者對朱子學的傳承與受朱子弟子黃幹影響的南方浙江金華和江西地區朱子學發展及其不同特點。相關論著請參：孫克寬：《元代金華學述》（臺中：私立東海大學，1975年）；陳榮捷：〈元代之朱子學〉，載所著《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頁299–329；王明蓀：〈略述元代朱子學之盛〉，《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6卷第12期（1983年12月），頁12–18。新近學者強調徽州與金華等其他南方地區一樣，也是元代朱子學發展極為興盛的區域。除上揭葉天賜文外，史甄陶〈元代中前期徽州朱子學——以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探討了元代中前期徽州朱子學的發展情況。值得注意的是，由宋入元，地域文化往往影響學風士習，學界多能注意南北學術的差異，但對浙江、江西、徽州各地朱子學和學風的比較研究，卻略顯薄弱。

¹³ 詹烜：〈東山趙先生汭行狀〉，載《全元文》，第59冊，頁207–8。

¹⁴ 趙汭：〈東山寓舍安神主祝文〉，載《全元文》，第54冊，頁546。

¹⁵ 趙汭：〈汪古逸先生行狀〉，載《全元文》，第54冊，頁386–87。

學，「遂絕意當世」，並自號古逸民。汪氏取朱子《四書集注》，「採擇群言，發揮微旨，每有得則疏之，不汲汲於成書」，故所著《四書集疏》直到死前未能脫稿。汪炎昶死後十九年，即至正十七年（1357），趙汭在行狀中稱許他及故宋遺老謂：「所以不可及者，其立身行己，流風遺韻，莫不皆有所自。」¹⁶可見趙汭不僅從汪氏學習朱子《四書》義理，對其堅貞氣節印象更為深刻。求學汪氏之前，趙汭受教於休寧的吳瀛（1296–1363）。吳瀛號白雲處士，學經於胡炳文（1250–1333）、陳櫟（1252–1334），與朱升（1299–1370）、汪克寬（1304–1372）「友道尤篤」。據載，吳瀛「絕口不談仕進」，「甘隱山林，以道自樂」，把當時的「婣戚俊茂」趙汭、後師事鄭玉的鄭潛，「招置家塾，飲食訓督，無異己子」。¹⁷

趙汭「少長遍詣郡之師儒」，還從遊於鄭玉。¹⁸至順二年（1331），鄭玉於師山書院講學授徒，趙汭受學即在此時前後。鄭玉早年因父任官於浙江淳安而從遊於當地名儒。自南宋儒士錢時傳陸九淵門人楊簡（1141–1226）之學，「淳安之士皆明陸氏之學」。鄭玉早年的老師吳暉、洪震老、夏溥皆講陸學。鄭玉回新安後，卻「益讀朱子之書，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¹⁹鄭玉晚年雖尊信朱子之學，但對陸學並不排抑，這無疑影響到趙汭。而趙汭求學於夏溥，也必是受鄭玉的影響。

夏溥，字大之，至治三年（1323）舉人，授湖州安定書院山長，歷江西龍興教授。他的父親夏希賢是陸九淵大弟子楊簡的再傳弟子。夏溥家學淵源，博通經學，工於詩詞，明「《易》象、《春秋》之學」。²⁰早在至元三年（1337）之前，趙汭首次離開徽州，去淳安拜訪了夏溥。此次拜訪，趙汭印象格外深刻，甚至在至正九年（1349）冬給朋友的別序中提及此事。夏溥為「皆講陸氏之學」的浙江淳安地域儒者，認為新安的學者、士子多數只會專守或敷衍朱子文義。朱子在《論語章句集注·學而》疏通「為學」謂：「學之為言效也。」夏溥即以此為問：「然余竊怪《論語》篇端，以教訓學可也，所謂學之為言者，於義何所當邪？」飽讀朱子之書又嘗「疑難不一」的趙汭無以回應，但這次問學對他無疑是重要的：「聖經賢傳中，如夏先生所舉，可以關余口者多矣。蓋自是稍反其鹵莽滅裂者，以致力乎究竟謹審之道焉。」²¹從夏溥問學，令趙汭認識到固守或敷衍朱子之義並非為學之道，即便是朱子的文義也有待斟酌，至於朱子的義理精蘊更需於力思體認中獲得。

¹⁶ 同上注。

¹⁷ 唐文鳳：《梧崗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故白雲處士吳公行述〉，頁七上至七下。

¹⁸ 趙汭在給友人撰寫墓表時稱：「君昔與予遊師山鄭先生之門，情好深厚」。見趙汭：〈孝則居士程郡可紹墓表〉，載《全元文》，第54冊，頁567。

¹⁹ 鄭玉：〈洪本一先生墓誌銘〉，載《全元文》，第46冊，頁412。

²⁰ 沈翼機等：《浙江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八二〈人物·文苑〉，頁七上。

²¹ 趙汭：〈留別范季賢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314。

求學於夏溥只是趙汭四處遊學的開端。至元三年，年僅十九歲的趙汭聞江西九江的學問家黃澤(1259–1346)「杜門著述」，遂往請拜，「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²²此次問學，黃澤以朱子《論語章句集注·學而》「明善而復其初」的解釋，教育趙汭即便大儒如朱子，其解釋也不盡易知，不盡真知，為學之要在於「思而有得」：「其所謂初，何所指乎？以為稟生受分之始耶？則其氣質之雜，固與理以俱賦矣。以為赤子之心邪？則昔人蓋有聞襁褓之聲，而知其為大惡不仁者。是孰為初之可復耶？」²³黃澤原為蜀人，因戰亂入九江。宋元間，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²⁴「義理一宗程朱」的黃澤，治經兼重古注疏和「名物度數」的考訂，以實求經義為歸，主張學貴在深思自得。黃澤的治經和為學，對趙汭影響至巨。趙汭也承認此次問學的意義在於：「蓋由是益知講學而不切於己，治經而不究其事者，終無可得之道焉。」²⁵至正元年(1341)，趙汭再次往黃澤處請益。此行留了兩年，趙汭真得黃澤治《易》、《春秋》學之要。²⁶至正六年(1346)，趙汭從江西崇仁往九江，第三次拜訪黃澤，但黃氏已經去世。黃澤是趙汭的經業之師，趙汭為人稱許的《春秋》學成績主要來自黃氏的傳授和啟發。黃澤死後六年即至正十二年(1352)，趙汭給黃氏撰寫〈行狀〉，稱其「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不為仕進，「決意歸休，以六經絕學為己任」。²⁷從〈行狀〉的內容來看，黃澤樂學而不樂仕進、以道自任、清苦嚴毅的形象對於趙汭來說無疑記憶深刻，影響深遠。

至元三年，趙汭第一次從黃澤求學回休寧老家，就其所得，轉赴淳安求教於夏溥。夏溥對黃澤學問的取徑並不以為然，並向趙汭傳授其父夏希賢的為學本末。至正三年(1343)，趙汭第二次從黃澤處求學結束，適逢夏溥在江西龍興為教官，再次以黃澤所傳的學《春秋》書法及《易》六十四卦卦辭大義，求教於夏溥，²⁸夏氏竟「歎以徒費心力為戒，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²⁹黃澤教授學生引而不發，又以「積思

²² 詹烜：〈東山趙先生汭行狀〉，頁208。

²³ 趙汭：〈留別范季賢序〉，頁315。

²⁴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一八九〈黃澤傳〉，頁4323。又，如寓居於臨川的吳澄弟子虞集也深受家鄉蜀中學風的影響，他稱「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見虞集：《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局，1967年)，卷五〈送趙茂元序〉，頁二二下。

²⁵ 趙汭：〈留別范季賢序〉，頁315。

²⁶ 詹烜：〈東山趙先生汭行狀〉，頁208。

²⁷ 趙汭：〈黃楚望先生行狀〉，載《全文文》，第54冊，頁370–71。

²⁸ 金居敬：〈題跋〉，載《春秋師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末，頁二上。

²⁹ 詹烜：〈東山趙先生汭行狀〉，頁208。

自悟為主」，趙汭也承認一再思悟而「經歲不得其說」。³⁰夏溥告誡他「徒費心力」，殆指黃澤的教法而言。趙汭請教於夏氏的其它細節不得而知，但趙汭後又與夏溥見面受教。³¹

至正三年，趙汭拜訪夏溥後，東往杭州，遊學於黃潛(1277-1357)。潛，義烏人，時為浙江儒學提舉，以文名、功名、儒業著見東南。黃潛「以師道自居，不少借辭色，及誦〔趙汭〕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隨後，趙汭便求學於大儒吳澄(1249-1333)門人虞集(1272-1348)。虞集與黃潛、夏溥交遊相善，趙汭遊於虞集之門自是題中之義。但至正四年(1344)趙汭父卒，他不得不從浙江黃潛處還休寧。翌年，趙汭西往臨川，拜訪虞集。集累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當時已退隱於鄉。³²趙汭求學於虞集，確乃慕吳澄道學淵源之故：

然汭之幼也，嘗聞大江之西有吳先生焉。行修道立，為世表儀，而成已誨人，深有憂於空言之無益。及觀乎閣下所為〈行狀〉，而知為學之方矣。今先生之書，將家傳而人誦之，然其心學之淵微，非以其所聞者而表章之，則世蓋有未易知者矣。汭生於世二十有七年，老母今年七十有三，所以辭之而遠去者，其志誠在乎此而不敢失也。³³

吳澄雖是朱子門人黃幹(1152-1221)的三傳弟子，但思想上兼重陸九淵的「尊德性」之學，對朱子學者多習成說、少有精通經術的情況有所救正。³⁴新安是朱子之鄉，經術傳統一皆以敷衍朱子之說為務，其流弊到元末愈益明顯。趙汭有感於此，希望尋求吳澄「尊心」、「求放心」的學問，以得治朱子學的「為學之方」，期於聖人之學「真有所見、真有所得」。在上引的求學信中，趙汭道及留著年逾七旬、剛剛喪夫的母親在家，背井離鄉求學的情形，他的決心由此可見。

趙汭求學的信念當然能打動虞集，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虞集出題的具對中，道出朱熹與陸九淵早年成學雖不同、晚年終歸於一的認識，深得虞集的賞識，故「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³⁵至正六年，趙汭在虞集處求學一年後，還休寧家中，築東山精舍，授徒講學，耕讀其中。³⁶東山精舍由虞集題記，由虞集的門人時為江浙行

³⁰ 趙汭：〈黃楚望先生行狀〉，頁382。

³¹ 夏溥：〈送趙子常還休寧〉，載程敏政：《休寧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弘治四年(1491)刻本，卷三八，頁一三下。

³² 詹烜：〈東山趙先生汭行狀〉，頁208。

³³ 趙汭：〈上虞學士書〉，載《全元文》，第54冊，頁459。

³⁴ 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九二〈草廬學案〉，頁3037。

³⁵ 金居敬：〈題跋〉，頁二下。

³⁶ 《東山精舍記》載，至元丙子(1276)趙汭祖父購買東山餘地之事，距今「七十年矣」，可知精舍成於至正六年。見虞集：〈東山精舍記〉，載《全元文》，第27冊，頁52-53。

省參知政事、河北真定人蘇天爵(1294–1352)題額。³⁷至正六年冬，趙汭再往江西拜訪虞集，³⁸虞集對趙汭愈加賞識。至正八年(1348)五月，虞集病卒之際，趙汭在左右侍事，並按虞集生前的囑託撰寫其行狀大略。³⁹虞集對趙汭尤為器重，可見一斑。

三地的求學，還使得趙汭交遊廣泛。同郡的朱升、倪士毅(1303–1348)、汪克寬等都是趙汭交遊、討論學問的對象。朱升與趙汭同為休寧人，長趙汭二十歲，從學於陳櫟，與趙汭在鄉讀書的老師吳瀛「友道甚篤」，以至虞集門人江西新淦的練高把朱升當成是趙汭的老師。⁴⁰趙汭第二次拜訪黃澤便與朱升同往，⁴¹各得其著書大意，朱升因此「嘗集諸家為《春秋傳》」。⁴²趙汭晚年與朱升書信往來頻繁，討論《春秋》經旨。⁴³舊稿《春秋集傳》成書，朱升稱許此書：「《春秋》之說，定於此矣。」《春秋屬辭》將成書付刻，朱升乃「手抄一部，點抹甚精，脫誤處亦時竄定」，⁴⁴所以該書首次刊行時列朱升為「校正」。⁴⁵趙汭卒後，朱升不僅撰寫祭文，而且遴選趙氏詩文，為之作序，由趙汭的門人汪蔭「首刊而傳之」。⁴⁶倪士毅也是休寧人，從學於陳櫟，讀書教學終生，生前重要撰著《四書輯釋》先刻於至正元年，兩年後又加重訂，至正六年始成。期間，趙汭曾與倪士毅相互探討、修訂，⁴⁷所以《重訂四書輯釋》將趙汭列為「同訂」。⁴⁸至正十五年(1355)，趙汭自謂「以汭自幼為先生〔倪士毅〕所知，又號為能知先生者」，⁴⁹可見交遊之歡。汪克寬，祁門人，是朱子門人黃幹弟子饒魯的再傳，泰定三年(1326)舉人，著有《春秋經傳附錄纂疏》。趙汭的《春秋屬辭》，汪克寬亦有

³⁷ 孫岳頌等：《御定佩文齋書畫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九〈元吳叡篆書東山精舍記〉，頁六一上。

³⁸ 至正六年冬，趙汭奉休寧縣令唐棣之命往臨川，請虞集撰寫休寧學記。見朱升：《朱楓林集》(合肥：黃山書社，1992年)，卷一〇〈練高送行朱升的贈詩記〉，頁157。

³⁹ 趙汭：〈邵菴虞先生行狀〉，載《全元文》，第54冊，頁365–66。

⁴⁰ 朱升：〈練高送行朱升的贈詩記〉，頁157。

⁴¹ 彭澤、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七〈勳賢〉，頁二四下。

⁴² 趙汭：〈與宋景濂〉，載黃宗羲：《明文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四七，頁九上。

⁴³ 趙汭：〈答朱學正書〉，載《全元文》，第54冊，頁414–15；〈與朱楓林先生赴允升學正書〉，載同冊，頁466–68。按：〈與朱楓林先生赴允升學正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東山存稿》作〈與朱楓林先生允升學正書〉。

⁴⁴ 趙汭：〈與宋景濂〉，頁九下。

⁴⁵ 羅振玉：《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影印偽滿康德十年(1943)上虞羅振玉鉛印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卷一「春秋屬辭」條，頁三上。

⁴⁶ 《朱楓林集》，卷三〈集趙東山文藁序〉，頁40；卷八〈祭友趙東山文〉，頁129。

⁴⁷ 趙汭：〈答倪仲弘先生書〉，載《全元文》，第54冊，頁474–80，共四通書信。

⁴⁸ 永瑆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萬有文庫》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第8冊，《重訂四書輯釋》條，頁26。

⁴⁹ 趙汭：〈倪仲弘先生改葬誌〉，載《全元文》，第54冊，頁400。

校正之功。⁵⁰因為趙汭、汪克寬、倪士毅三人「朝夕講學」，在當時有「新安三有道」之稱。⁵¹

趙汭頻繁往來江西臨川、九江一帶遊學，亦廣交士友，吳澄的弟子袁明善便是趙汭交遊之一。袁明善，字誠夫，號樓山，臨川人。晚年教授於虞集之門，⁵²所以結識趙汭。袁氏據吳澄所授之旨著《四書日錄》，並於至正八年、九年間多次致書趙汭，與之商訂。據載，趙汭「為條別是非數萬言，袁公心服，多所更定」。⁵³趙汭與洪武初同以山林隱逸之士召為纂修《元史》的江西新喻人趙堯亦有交情，趙汭後以《春秋師說》、《春秋屬辭》求正於趙堯。⁵⁴趙汭還與陸學的傳人陳苑的再傳弟子、江西上饒人張率有過交往。⁵⁵

至正三年，趙汭去杭州拜訪黃潛，又於至正九年冬、至正十一年(1351)冬到杭州，⁵⁶所以他在浙江的交遊很多。趙汭除了與許謙再傳弟子、金華人蘇伯衡和淳安名儒徐尊生等有過交情，⁵⁷還與任官於浙江的蘇天爵交遊甚歡，和黃潛的門人宋濂(1310–1381)、王禕(1321–1372)等往來密切。蘇天爵，河北真定人，曾師事安熙(1269–1311)，又學於虞集。至正七年(1347)，蘇天爵官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九年召為大都路總管，雖因疾而歸，但很快又被任命為兩浙都轉運使，管理鹽政。十二年，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總兵於饒、信，卒於官。⁵⁸至正九年冬、十一年冬，趙汭往杭州，主要即拜訪蘇天爵，並因此結識了其幕僚高明。⁵⁹高氏和同為蘇氏的幕僚江西人葛廷哲曾為蘇天爵編輯詩文集《滋溪文稿》，趙汭為之序。⁶⁰趙汭與宋濂、王禕交遊也十分密切。趙汭除給宋濂的文集作序文，⁶¹還給其父撰寫悼念文字。⁶²趙汭後來把《春秋屬辭》請宋濂校正和作序，⁶³宋濂欣然答應。趙汭與王禕可稱故人，趙汭

⁵⁰ 趙汭：〈與宋景濂〉，頁九上。

⁵¹ 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七〇，頁2359。

⁵² 同上注，卷九二，頁3075。

⁵³ 詹烜：〈東山趙先生汭行狀〉，頁209。

⁵⁴ 趙汭：〈答趙伯友〉，載《全元文》，第54冊，頁468–69。

⁵⁵ 趙汭：〈送上饒張孟循父還吁江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456–57。

⁵⁶ 趙汭：〈醫說〉，載《全元文》，第54冊，頁542。

⁵⁷ 趙汭曾稱呼蘇伯衡為「故人」，見趙汭：〈送唐思恭歸金華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308。趙汭與徐尊生的交往，見趙汭：〈答徐大年書〉，載《全元文》，第54冊，頁461–65。

⁵⁸ 《元史》，卷一八三〈蘇天爵傳〉，頁4226。

⁵⁹ 趙汭：〈送高則誠歸永嘉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300–302。

⁶⁰ 趙汭：〈滋溪文稿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329–30。

⁶¹ 趙汭：〈潛溪後集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331–32。

⁶² 趙汭：〈宋處士末〉，載《全元文》，第54冊，頁408–9。

⁶³ 趙汭：〈與宋景濂〉，頁一〇下、九下。

不僅於至正十一年冬與王禕相見於杭州並給其書堂作記，⁶⁴而且於洪武初修史之際給他的文集作序。⁶⁵無怪乎趙汸雖不情願被召修《元史》，但當他從休寧出發，北上金陵，舟次淳安，途遇宋濂、王禕，卻激動不已，以為不虛此行。⁶⁶

綜觀趙汸的遊學歷程，廣泛而周折，早年在鄉學於吳濬、汪炎昶和鄭玉，後輾轉於浙江淳安和杭州、江西臨川和九江等地，求學於陸學傳人夏溥，請益於以朱子道統自任的金華儒者黃潛，執經於「以六經復古」為己任的黃澤，拜師於重「尊德性」的吳澄弟子虞集。三地的求學，還令他交遊眾多，徽州的朱升、倪士毅、汪克寬是他重要論學對象，浙江金華的宋濂、王禕是他的摯友，而與名宦蘇天爵等人的來往，使他志向聖賢之學外，還特別關心現實政治。遊學浙江、江西等地，對趙汸思想特色的形成極為重要：夏溥、黃澤令他對朱子成說好疑深思，不以敷衍朱子文義為務，追求「切於己」的自得之學和「究其事」的治經要領；虞集讓他明白博學知要，通之貫之的治學、治經方法。⁶⁷而從學於鄭玉、夏溥以及傳吳澄「遵德性」之學的虞集，還令趙汸對陸學極其包容。值得提出的是，過往有關趙汸的生平傳記和近人研究，都忽視了他在鄉的師承影響，趙汸門人給他撰寫的〈行狀〉中也僅提及「少長遍詣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志」。⁶⁸如果說趙汸早年因「自知孱弱如此，定非應世之具」而捨棄舉業仕進，⁶⁹還是合情合理的，那麼他在徽州「遍詣師儒」後，仍不顧親友之非議而變賣田產以作「負笈四方」之資，只能與元末徽州朱子學流弊直接相關。而趙汸早年的遊學經歷，反過來，令他學成歸後，對徽州學者的治學取向保持有清醒的審視和檢討，並加以批評和救正，從而形成自己的思想特色。

「為己」、「反己」之學：趙汸的思想主張和特色

元代治朱子學者的主要趨向是增益豐富朱子之言，疏通其已成之書而補備其未成之說。⁷⁰以朱子《四書集注》為例，晚宋真德秀(1178–1235)撰《四書集編》，引朱子言論中相關之說，對朱子《四書》傳注再加注疏。此後，蔡模著《四書集疏》，趙順孫

⁶⁴ 趙汸：〈華川之舍記〉，載《全元文》，第54冊，頁337–38。據《四庫全書》本《東山存稿》作〈華川書舍記〉，《全元文》誤。

⁶⁵ 趙汸：〈華川文集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434–35。

⁶⁶ 趙汸：〈送操公琬先生歸番陽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436–37。

⁶⁷ 趙汸：〈留別范季賢序〉，頁314–15。

⁶⁸ 詹烜：〈東山趙先生汸行狀〉，頁208。

⁶⁹ 趙汸：〈與宋景濂〉，頁一〇上。

⁷⁰ 請參朱鴻林：〈丘濬《朱子學的》與宋元明初朱子學的相關問題〉，載所著《中國近世儒學的思辨及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20–42。元儒熊禾的思想和著述即是此類趨向的代表，另參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學術思想問題及其從祀孔廟的議案〉，載《中國近世儒學的思辨及習學》，頁37–69。

(1215–1277) 著《四書纂疏》，都是在同樣的基礎上，旁搜朱子門人相關之論，豐富朱子的《集注》。這一做法，入元之後，被堅守傳統朱子學的徽州學者所承接和發揚。胡炳文撰《四書通》，陳櫟撰《四書發明》，陳櫟門人倪士毅合二書為一而成《四書輯釋》，以及上文提到趙汭老師汪炎昶卒前尚未撰成的《四書集疏》，無不是增益朱子《四書集注》的工作。同樣的工作，還可見於朱子所著經說上。以朱子《周易本義》、《周易啟蒙》而論，宋末元初，善承朱子之志的熊禾(1247–1312)著《周易講義》，就是為闡發、豐富朱子之說而作的。⁷¹新安學者的志向一如熊禾，守先待後般疏通、補充朱子之著。胡方平的《易學啟蒙通釋》，與熊禾互相勉勵於朱子學的胡一桂(1247–?)撰寫的《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啟蒙翼傳》，以及胡炳文的《周易本義通釋》、⁷²程直方的《程氏啟蒙翼傳》，⁷³皆是補充、推衍朱子已成之書的作品。以徽州中期重要的儒者陳櫟為例，他「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餘數十萬言。其畔於朱子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意，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補而益之」。⁷⁴徽州士人一以朱學為宗，為朱子學說申說、補備的治學取向和特點，盡顯無餘。

豐富、完善學說創始人的論著本來就是學派形成過程中重要而常見之事，它還與有意系統化總結、編輯學創始人的學說以便初學入門深造自得的編纂相伴而生。但綜觀宋元之際朱子學的發展，前者遠較後者為治朱子學者所津津樂道。⁷⁵其中的原委還有待研究，但事實上隨著豐富學說創始人論著的出現和累積，而編輯學派創始人學說的著作卻長期隱而不彰，學說的本來原貌和精神便有漸次失去的流弊。勵志學問的初學者，不得為學之要，甚或誤入歧途，便也會普遍常有。

趙汭弱冠之後離開徽州，四方求學，多少可以反觀徽州士人的風氣及其出現的問題。講論一以朱子之學為本本來無可非議，問題的關鍵在於學者講論的方法和引導的傾向，能否讓初學者認受朱子之學的要領和真切精神的所在。如上文所見，徽州的學者，思想上以恪守朱子之學為特色，學問上以豐富朱子之說為訴求，教學也多以詳熟朱子成說為內容。其流弊也顯而易見：初學者或難得為學之要，更甚者則以誦習經訓、辨釋文義為務。至正九年，趙汭在給友人勸學性質的贈別序文中，追憶自己早年求學的經歷謂：「僕之鄉先生皆善著書，所以羽翼夫程朱之教者，具有成

⁷¹ 相關討論請參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傳記問題》，載《中國近世儒學的思辨及習學》，頁20–36。

⁷² 參見永榕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2冊，《易本義附錄纂疏》條、《易學啟蒙翼傳》條、《周易本義通釋》條，頁1–2，7–8。

⁷³ 程瞳：《新安學繫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綠蔭園重修本，卷一一，頁九上。

⁷⁴ 同上注，卷一二，頁一上。

⁷⁵ 朱鴻林：〈丘濬《朱子學的》與宋元明初朱子學的相關問題〉，頁136。

說。僕自幼即已受讀，然未知所以為學也。」⁷⁶徽州儒者汲汲於著書立論，羽翼程朱之教，但趙汸卻不得為學要領。需要指出的是，趙汸在該篇贈序的下文卻強調遊學於浙江、江西等地學者對他成學的重要影響，⁷⁷明顯可見他不滿於「鄉先生」的學問取向和教法。這種不滿之情，在他求學於虞集時表露得更加透徹：「早學於鄉，所求朱程之緒餘者，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以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⁷⁸徽州儒者以補備、豐富甚或誦習程朱之成說為已足，趙汸顯然不以為然，所以他多方求學，特別是向虞集求吳澄的道學原委和尊本心、求放心的為學之方，以為知至、誠意的聖賢之學。

由上可見，趙汸四方遊學，重要的原因在於元代徽州朱子學已經弊病叢生，最精英的儒者都以豐衍朱子之說為務，甚至多少與朱子批駁的訓詁之學無異，朱子學的精義所在沒有彰顯，遑論實踐。更有甚者，以詳熟朱子之言說為致知之學，不得為學要領，以致流為俗學。

事實上，趙汸遊學的經歷，令他對徽州的學風多有批評和救正，對塑造他的思想特色和主張也有重要影響。他的朋友倪士毅撰寫《四書輯釋》，刊行後又重訂，與趙汸商討再三。倪氏重訂《四書輯釋》前有一凡例，自稱該書為「點掇訓釋以便初學」之用。趙汸卻不同意：

但朱子著書，或詳或略，必有深意存焉，非是不為初學作計。若必欲剔抉無遺，使人一覽意盡，則入耳出口者得以肆其滅裂，沈潛玩索者無所用其心思，徒增浮躁之風，罕有自得之妙。所謂語意平常者，似可省去也。《四書》海涵地負，初學所未解者多矣，豈能一一點掇邪？⁷⁹

在趙汸看來，豐富朱子之說的學者，考索愈多，文辭愈密，愈會適得其反，不僅令初學者不會自得，甚且連朱子的本意所在也不能顯見。趙汸直截了當地指出問題所在：

自有《四書集註》後，唯勉齋〔黃幹〕、西山〔真德秀〕、雙峰〔饒魯〕暨胡先生〔胡炳文〕多所發明，皆是於《四書》中有真見者。雙峰融貫朱子之論，時有失其真處。胡先生必欲章章出一通旨，是以過求處尤不少耳。⁸⁰

趙汸看到了朱子學者因融會而失真、過求的流弊，他認為學朱子之學者應該認識朱子對於《四書》尤其是《大學》已經「俱有成說，無復餘蘊」，學者當體認朱子之說，而

⁷⁶ 趙汸：〈留別范季賢序〉，頁314。

⁷⁷ 同上注，頁314-15。

⁷⁸ 虞集：〈東山精舍記〉，頁53。

⁷⁹ 趙汸：〈答倪仲弘先生書〉，頁476-77。

⁸⁰ 同上注，頁477。

非僅僅疏通文義，或者像胡炳文的《四書通》和吳真子的《四書集成》一般，「強生議論」、「故於枝蔓上更出枝蔓」。⁸¹

趙汭批評的重點在於豐富朱子學說的工作，並非僅僅搜羅言論、敷衍文義而已，而是先對朱子之說有一個貫通的認知，然後體認其思想內涵，能有自得和真見。這樣的想法，在趙汭給倪士毅第三通書信中論及陳櫟之處，更見透徹。陳櫟是倪士毅的老師，趙汭竟在倪氏之前公然指陳陳櫟的論著：

近日偶觀東阜翁〔陳櫟〕《禮記集義》，綱領有云：「儒家以《大學》為門戶，《中庸》為闡奧，入其門庭，造其闡奧，由是而讀《戴記》之四十七篇，大本立矣，宜無難者。」反覆數過，殊未知其旨意所在。若只以誦習其說，便為入其門庭，通貫其義，便為入其闡奧，則子思子所謂立大本者，恐不謂是。未審老先生所謂門庭、闡奧，當是何事？乃復有待於誦讀《戴記》而後大本可立邪？⁸²

趙汭對陳櫟著書立論以教育後進的引導傾向很不以為然是顯見的。⁸³「誦習其說」、「通貫其義」不僅於程朱之學罕有闡發和自得，更令後學不知所從，甚至誤入歧途。趙汭的意見在於學者先須「立大本」，以知為學之要，道學原委為先。因此趙汭說：

朱子之所以審問而明辨之者，豈特文義之間而已哉？若只以文義求之，則是書有《章句》，有《或問》，有門人之錄，有石氏所輯，因其所已言而求其所未言，思過半矣。若必欲視為己事，則程子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而「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恐非可以尋行數墨而求之紙上也。……〔朱子〕又嘗謂：「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其所謂聖賢工夫，某工夫，必有事實，決非虛言。然則苟不求其工夫所在，以實用其力，而遽欲苟附益于聖經賢傳之間，皆朱子之所不許也。⁸⁴

趙汭認為朱子的道學斷斷不可以辨識文義、疏通成說便能達到，即便是文義的理解，也不主張對其已成之說加以過多地闡發。且不論其闡發的文義有所偏離，過度

⁸¹ 同上注。

⁸² 同上注，頁478。

⁸³ 趙汭甚至批評陳櫟《禮記集義》中所謂的「綱領」：「嘗觀朱子自序有曰，沈潛反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此蓋語人以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使毋以易心求之也。既曰恍然，又曰似有，則有非『指要綱領』四字所能發明者矣。」見趙汭：〈答倪仲弘先生書〉，頁479。

⁸⁴ 趙汭：〈答倪仲弘先生書〉，頁478-79。

的闡發只能使朱子道學的「全體大用」不得彰顯。⁸⁵在趙汸看來，還不如回到朱子學說及言論行事中求其大本達道，然後實用聖賢工夫，加之篤實的踐行，才是為學的途徑和歸宿。

趙汸相信「程朱二先生發明斯道，庶幾無復餘蘊」，在道明理精之際，學者若「以辨析義理便是朱子之學，纂述編綴便是有功斯文」，而「于向上功夫鮮有發明，日用之間無所容力」的話，理學便走向空虛，道學即漸失傳。所以趙汸認為：「士之為學，必於斯道之全體大用稍能窺其大綱，而又必於其知之所至、行之所逮、淺深分數，無毫髮之不自知，然後知行交勉，日有程課，而進修之序有所考，師友之教有所施也。」趙汸強調道學的「全體大用」，為學先能「窺其大綱」，然後知行並進，進修有序，師友有教，終而致知有方，成德有期。趙汸認為「義理浸灌」，粗通六藝，只是「知性中一事耳」，學貴「反己而思」。正如他給倪士毅的第四通書信中所說：「苟不能於為己、為人之際，一刀兩段，發憤刊落，然後實求反己親切之訓，以致其絕利一源之功，而徒爾朝繙暮閉，口誦手抄，則是終身無由知至，畢世不能意誠，而釋迦達摩果賢於孔孟矣？」⁸⁶趙汸以「為己之學」為聖賢之學與否的界限，無疑是針對當時朱子學者學風流弊而發，具有強烈的救正意義。

趙汸主張的「反己」、「為己」之學，更見諸其行。他在給交遊葛廷哲的別序文中，以學貴「能立己，則擴充變化之機在我」相互勉勵。⁸⁷他以學本諸心，仁義之美生而有之，所以鼓勵後學「反而求之，擴而充之」。實用工夫，則氣質可變，聖學可至。⁸⁸至正六年，他讀書精舍，學古明經。在〈共學齋記〉中，趙汸以為道之不明，在於士君子不能「反諸身以為學」，號召同學復古以明道：

〔自程朱理學大明，〕然其間善學者，乃復因其性之所近，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己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則君子之學，夫豈易言也哉！……人固與庶物並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識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別，矧學不至於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於芒忽而不自知，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⁸⁹

聖賢之學雖經程朱理學闡發而大明於世，但要承續此學卻並非易事。善學者不僅要讀書好學，體悟精思，更重視「反己致曲」的為學功夫，而後道學可傳，聖賢之學可為。

總括而言，趙汸所以離開徽州而四方遊學，原因在於徽州學術流弊叢生，致使他始終不得為學要領。遊學的經歷，反過來又令他對徽州學者的治學風氣和取向有

⁸⁵ 所以趙汸認為：「聖學復明於近代，士始以知道為宗。久之又失其傳，而學者益以空言自蔽。」見趙汸：〈倪仲弘先生改葬誌〉，載《全元文》，第54冊，頁400。

⁸⁶ 趙汸：〈答倪仲弘先生書〉，頁475-80。

⁸⁷ 趙汸：〈別葛廷哲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443。

⁸⁸ 趙汸：〈范叔豹字說〉，載《全元文》，第54冊，頁394。

⁸⁹ 趙汸：〈共學齋記〉，載《全元文》，第54冊，頁334-35。

所批評和救正，即便是他的老師輩如胡炳文、陳櫟，或者他的論學摯友如倪士毅，都能直陳不滿。徽州學術流弊固然在於過多闡發、補備朱子之言，反使朱子學的精義不顯於世，後學不明道之全體大用，甚者以辨析文義便是致知之學，而趙汭揭糝「反己」、「為己」之學，主張學貴為己，反身而求，無疑是因弊救病之論。

「容」陸「取」朱：以〈對問江右六君子策〉為中心的探討

由上文可見，徽州朱子學者的學風令朱子學的本來面貌支離破碎，趙汭提倡「為己」、「全體大用」之學以補救朱學流弊，開導後學。趙汭的求學經歷顯示他受過陸學的影響，他的主張也與陸學尊本心之學有相契之處，但他畢竟受過嚴謹的朱子學教育並且嚴守所學，而史家所樂道他融會朱、陸也多是斷章取義，原因即在於未能結合趙汭的求學經歷、階段而倉促下定論。

清代學者全祖望明確提出趙汭「和會朱、陸」說，⁹⁰對當今思想史研究者影響甚巨。無論是全氏，或是近代學者，提出趙汭「和會朱、陸」說的主要根據，便是他二十七歲（至正五年）求學虞集時所作〈對問江右六君子策〉。趙汭的主要論點是，朱子學宗周、程，而周、程學顏子之學，陸子以孟子為師，朱、陸兩家入學門徑固然有不同之處，但皆重視義利之辨，則不同之中又有同焉；二家所不同，始於無極、太極之辨，至鵝湖之會，陸氏指摘朱學支離，朱子曰陸學簡易，二氏之學不同始彰；朱子後來認為自己道問學為多，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而陸子在撰寫呂祖謙的祭文中也稱自己以前「粗心浮氣」，二氏之學在晚年客觀上終多契合。

〈對問江右六君子策〉的論斷，雖給明代以來的思想界帶來一定影響，但撰寫的背景值得交待。虞集是策問的出題人，他的思想以宗朱為主，兼取陸學。他在策問中就隱含融會朱、陸的意味，而他在摘編朱子的書信言論時發現，朱熹晚年感到支離泛濫之病而悟及「反身而求」，婉轉說明朱熹生前就有兼取陸學的想法。⁹¹可見，虞集的思想已經具備趙汭上述論斷的核心部份。趙汭的策文，撰成於問學黃澤結束後求學於虞集之際。黃澤和虞集「有世契」，⁹²彼此並不陌生。虞集的老師吳澄曾給黃澤所著《易學濫觴》、《六經補注》撰寫序文，極力推許黃澤的經學，所以趙汭稱吳澄「最為知先生〔黃澤〕者」。⁹³趙汭首次見到虞集，虞集先問及黃澤的概況，改日他

⁹⁰ 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七七〈槐堂諸儒學案·章從軒先生節夫〉，頁2594。另參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四四〈奉臨川先生帖子一〉，頁一上。

⁹¹ 虞集：〈跋朱文公答陸王安公書〉，載《全元文》，第27冊，頁350。

⁹² 金居敬：〈題跋〉，頁二上。

⁹³ 趙汭：〈黃楚望先生行狀〉，頁379。

向虞集說明了黃澤著書大意以及夏溥不以為然的情況。⁹⁴這時適逢江西憲司舉行私試，虞集出〈江右六君子策〉為問。據趙汭門人金居敬的記載，趙汭「識其意」，故有〈對問江右六君子策〉之文，並得到虞集的賞識。作為求學的學子，撰寫帶有已經隱含傾向性答案的策問，加之先前就已經和虞集會面交接不錯，趙汭撰寫之大意，「投其所好」也是應有之義。

無論趙汭撰寫策文的背景、動機如何，他的思想包容陸學是明顯不過的。但趙汭思想的主體和實踐是朱子學的，即便在〈對問江右六君子策〉中，他對朱子學的偏向也相當明顯。在闡發朱、陸無極、太極之辯時稱：

夫以中訓極者，是知太極之本體矣，而中非太極所以得名之實也。謂《易》有太極，不當言無者，是知論太極者之不當淪於高虛矣，而猶未知周子立言之妙也。然觀朱子嘗謂子靜不知有氣稟之性，則其於周子之書，庸有未深考者矣。⁹⁵

與朱子不同，陸氏主張太極之上不當有無極，且以「中」訓「極」字，所以與朱子往復論辯。趙汭卻明顯偏袒朱子一方，認為陸氏所主雖有可取之處，但他其實並未貫通、理解周敦頤的著論而起爭議。在論述鵝湖之會終以不合而罷，趙汭謂：

夫所謂「墟墓而哀」也，「宗廟而欽」也，即孟子所謂「人見孺子將入井之心」，而朱子所謂「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者也」，原其所指，皆由已發之心而悟其未發之性，則其要歸，亦有不容於不同者。⁹⁶

思想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陸氏自矜自己的學問為求聖賢本心之學，譏諷朱子的學問支離而不得要領，當時朱熹並沒有正面回應。⁹⁷生於朱子後一百二十年的趙汭，卻在論述此段公案時認為，陸氏所謂求本心之學，在朱熹博大的思想世界中也有相應的部份，他們的要旨並無二致。

由上可見，趙汭代朱子立言辯護的傾向非常明顯。在論及朱、陸晚年多有相合時，趙汭傾向朱子一方更加顯見：

子朱子之答項平甫也，其言曰：「自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為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

⁹⁴ 金居敬：〈題跋〉，頁二上至二下。

⁹⁵ 趙汭：〈對問江右六君子策〉，載《全元文》，第54冊，頁432。

⁹⁶ 同上注。

⁹⁷ 有關鵝湖之會及此後朱、陸之辯的過程和朱、陸哲學的主要分歧，請參看陳來：〈朱陸之辯〉，載所著《朱熹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頁314-412。

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觀乎此言，則朱子進德之序，可見矣。陸先生之祭呂伯恭也，其言曰：「迨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觀乎斯言，則先生克己之勇可知矣。……而子靜則既往矣，抑不知子朱子後來德盛仁熟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為如何也？⁹⁸

趙汭認為，陸子專是尊德性之學，朱熹早年雖以道問學為主，但並沒有放棄尊德性之事；朱子有一定的致學達道的路徑即所謂「進德之序」，一旦學富思熟而「反身用力」，便很快達到「德盛仁熟」的境地。陸氏雖有「克己之勇」，但趙汭暗含並無下文之意，與朱子晚年造詣不可同日而語。趙汭以下的說話更耐人尋味：

若曰苟此心之存，則擴充持守為可略；學貴自得，則思索講習之皆非。則雖學知力行之士，不足以語此，而況於小子後生之至愚極暗者乎？《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徒易簡之云乎？此先生〔陸九淵〕之高明所以為不可及也，然則其可以易而言之乎？奈何前修日遠，後學寡師，求之而不得其要，察焉而不見其端，於是專務考索者傳會繳繞，而終不知本心之猶在；致力持守者私心自用，而卒無以異於常人。⁹⁹

趙汭雖重視和理解陸氏所講「求本心」的自得之學，但更加強調讀書窮理、思辨力行的學問取徑的重要性。在趙汭看來，陸學並非易知，更非易達，他雖反對治朱子學者「專務考索」而不知「本心之猶在」，但更不主張只知「持守本心」而不讀書窮理以致淪為庸徒。

結合趙汭求學結束後의思想和行動，我們更可以確定他不僅對朱子之學尊信備至，而且力行朱子之教。至正九年，袁明善寫信給趙汭，稱他於「統宗會元之際，欠著工夫」，讀經典不甚融貫，並謂朱子也有此弊，而持守朱子之說的學者此弊更甚。趙汭認為他這是「從下窺高、以意識卜度」，並進而強調「若夫向裏一關，無所開發，而徒欲守先哲之見以為己見，誦先哲之言以為己言，則小子雖陋，亦未忍自畫於斯」。¹⁰⁰ 袁氏所著《四書日錄》多宗程顥（1032–1085）之言，¹⁰¹ 實則借助、發揮程子之言而背離朱子之說，趙汭皆一一為之辨正。¹⁰² 他還以朱子「填補前日欠闕，栽種後來

⁹⁸ 趙汭：〈對問江右六君子策〉，頁432–33。

⁹⁹ 同上注，頁433。

¹⁰⁰ 趙汭：〈與袁誠夫先生答四書日錄疑義書〉，載《全元文》，第54冊，頁481。

¹⁰¹ 趙汭：〈答倪仲弘先生書〉，頁479。

¹⁰² 詹烜：〈東山趙先生汭行狀〉，頁209。

根株」、「予之學，自銖積寸累而成」等言開導、勉勵門人明白讀書窮理、日積月累的重要。¹⁰³

趙汭洞悉徽州朱子學的流弊，有意救正，遂築精舍讀書窮經，力行朱子之教，晚年在補備朱子未竟之說的《春秋》經典上貢獻有加，不啻朱子功臣。至正十一年冬，他給好友王禕的書齋作記稱：

迨新安朱子繼周程之緒，大明經訓，以覺斯人。而浙河以東，若呂〔祖謙〕、薛〔季宣〕、二鄭氏〔鄭伯熊、鄭伯英〕，取周公舊章，離析錯綜，如示諸掌，學者始由斯得以窺見聖人制作之盛焉。然當是時，陸子靜氏出於臨川，以其得於心者，行乎家邦，充然自足，而諸君子之志荒矣！薛、鄭會歸於朱子，而呂氏則無間焉。陳君舉〔陳傅良〕，薛之徒也，乃自以書請益於陸氏，此又論先哲於鄉土者，所宜慎思而明辨也，況夫有志於斯文者乎？¹⁰⁴

趙汭認為朱子不僅上承周、程理學大成，對經典的研究有功聖人，同時表揚浙東的呂祖謙等能實用其學，考章訓典；但隨著陸學漸昌，浙東的陳傅良卻求本心之學於陸氏，從此浙東其他學者的志業也日漸荒疏。趙汭借助學術史的回顧，希望王禕有所借鑑。可見，趙汭對陸學一味求「本心」而於經典無所用力 and 發明，隱含微辭。更有趣的是，中年至晚年，鑽研《春秋》的趙汭，還以「支離漢」、「支離無謂」自謙。¹⁰⁵他以自身治學的實踐顯示，陸氏所譏朱子學者「支離」之弊，並不足病朱子及善學朱子的學者，讀書窮經的「下學」工夫，不僅是「向上」工夫的歷練，本身還有功於聖門經術。

可見，趙汭平生治學的取向和依歸是朱子學的，治學的實踐更顯示他忠實而善承朱子之志，而他二十七歲求學於虞集時所作之〈對問江右六君子策〉，一方面投虞集之所好，另一方面他在行文間始終偏向朱子學，甚至有代朱子立言辯護的意味。至於文末強調陸學既不易知又不易入，學當學朱子之讀書窮理，也是順承連貫之義。

趙汭雖承認陸學是聖賢之學，對陸學表示包容，卻不主張取效其人其學，這種「容」陸而「取」朱的思想傾向在元末也不是孤立的現象。虞集曾稱：「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為非，此亦非有見於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¹⁰⁶對陸學有所

¹⁰³ 趙汭：〈答任本初〉，載《全元文》，第54冊，頁460-61。

¹⁰⁴ 趙汭：〈華川之舍記〉，頁338。

¹⁰⁵ 趙汭〈初建精舍四絕〉第二首有謂：「山合東西無面勢，水流高下少縈紆。中間著箇支離漢，月朗風清得自如。」見程敏政：《休寧志》，卷三七，頁一一上。趙汭不僅以「支離漢」自稱，還以「支離無謂」自現。見趙汭：〈櫟軒記〉，載《全元文》，第54冊，頁340-41。

¹⁰⁶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一〈送李彥方閩憲〉，頁一下至一二上。

兼取的虞集，極力反對廢棄程朱之說和讀書窮理，這與趙汭的主張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對陸學「容」而不「取」的態度和情形，趙汭的老師鄭玉更具代表性。鄭玉認為二氏之學所入之途不同，但其「大本達道」無所不同，學者當求同於二家而不可自立門戶。¹⁰⁷但鄭玉的思想卻傾向朱子之學，不主張在個人學問取向和實際問學上取效陸學，因為在他看來，陸氏之學，「其教盡是略下工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有弊。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¹⁰⁸於此看來，元代所謂的「和會」朱、陸的思想潮流，¹⁰⁹需要深入檢討。以趙汭的個案來看，他對陸學的兼取，也只是局限於陸學的某些理念恰能與他為挽救朱學流弊而提出的相關主張相契而已，更何況朱子學本身也強調尊心而求反己之學。¹¹⁰元代的學術，無論是朝廷的表揚，還是學者的學問實踐，主體是朱子學的，學問的追求是篤實的，這風氣一直延續到明初。¹¹¹

經學復古：趙汭注經的動力和期許

元代學者雖於程朱理學形而上的探討興趣不大，發明也不多，但尊程朱之說，行程朱之教，承朱子道統觀，或闡程朱之文義，或力行其學，或以道統自任，朱學無疑鼎盛而備受朝野尊崇。¹¹²不容忽視的是，程朱義理雖精，但經說卻並不足為式，仍有待後學不斷補備以臻於善。以《易》經而言，朱子便不滿程頤《程氏易傳》，因為程氏以義理推說經文，未必符合經典原意，所以朱子主張實求經義，而他所作《周易本義》、《周易啟蒙》也為後學繼續致力鑽研提供了方向。¹¹³以《春秋》經來看，朱子對程頤未完成的《春秋傳》和其弟子胡安國的《春秋傳》最主要的不滿在於，其所說義理雖正，但未免穿鑿附會，以至說得太深，不合聖人本義。大體看來，朱子不主張初

¹⁰⁷ 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九四，所摘錄反映鄭玉思想的文字材料下第10條，頁3128。

¹⁰⁸ 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九四，頁3127。

¹⁰⁹ 參看侯外廬等：《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749-67。

¹¹⁰ 金春峰認為，朱熹以後，黃幹、真德秀、魏了翁及許謙、吳澄，並非以陸解朱，而是堅守朱熹思想的基本點和大方向，只是因朱學末流之弊而有意強調朱熹的「尊德性」的一面，因此注意到陸學「先立乎其大」的論調而給予表彰。見金春峰：〈朱熹至元儒對《大學》的解釋及所謂「朱陸合流」問題〉，載《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761-94。從趙汭的個案來看，我贊成金氏的結論。

¹¹¹ 元儒多崇朱，一方面因為程朱理學被列為官學，另一方面當與如虞集、趙汭、鄭玉等為代表的儒者對陸學的認知有關：包容陸學，卻不主張取效其學。當然，吳澄、虞集、鄭玉等所謂的崇朱，還需要結合他們面臨的具體學術環境和境遇以及他們的思想歷程而論。這將勢必有助於我們瞭解元代思想史它本就具有的豐富意涵和多元面向。

¹¹² 陳榮捷：〈元代之朱子學〉，頁299-329。

¹¹³ 錢穆：〈朱子之易學〉，載所著《朱子新學案》（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頁1231-66。

學者輕率治《春秋》，但他確曾深研過《春秋》，見諸其《文集》和《朱子語類》。他有系統的治《春秋》方法：《春秋》有聖人筆削，有魯史舊文，但極不易分曉，不可硬說，更不宜以字字見褒貶，或以例釋經；經傳互看，重視從《左傳》中看出聖人筆削和時事之大體，先作史的工夫，久之忽然貫通而悟入；三傳各有得失，《左傳》「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公》、《穀》「考事甚疏，然義理卻精」，學者貴在兼采眾長而有所折中。¹¹⁴

可見，朱子解經強調折中各家之長，既重義理之明正，又以實據求之，以復經典本義為歸。以朱子對《春秋》的態度和綱領性意見而論，元代的學者多能以此而補備申說。雖然元代科舉考試規定《春秋》取三傳與胡傳，治《春秋》尊胡傳幾成風氣，甚至齊胡傳於三傳而有「四傳之名」，¹¹⁵但元人治《春秋》還有宗朱之一路，這以吳澄《易纂言》、王元傑《春秋讞義》為代表。¹¹⁶

從治經的方法和態度來看，趙汭的老師黃澤無疑是善承朱子之志的。黃澤篤信程朱之學，年輕時便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晚年以「六經絕學為己任」，主張六經復古之義，就連大儒吳澄也對他的經學深表欽佩。¹¹⁷黃澤繼承朱子的精神，主張《春秋》以求書法為先，強調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對三傳皆有批評，但要求學者「事據《左氏》，義參《公》、《穀》」，經傳互證。¹¹⁸更為重要的是，黃澤治經，一切以實義求之，主張反覆用功致力以求向上工夫，以積思自悟為主而達一旦忽然貫通，以程朱理明義精之學而參以漢儒博物考古之功，¹¹⁹無疑善得朱熹治經精神和要領。

趙汭用心於《春秋》學的研究，一方面是完成其師黃澤六經復古的志向所致，¹²⁰同時也有內在的動力。至正六年，趙汭贈詩友人謂：「關洛有遺言，本根實在茲。及門多通明，經說乃見譏。朱子晚所造，卓絕知者希。象山如可作，豈復憂支離。使

¹¹⁴ 以上請參錢穆：〈朱子之春秋學〉，載《朱子新學案》，頁1297-1308；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頁76-78；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484-96。

¹¹⁵ 見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6冊，《春秋集傳釋義大成》條，頁39。

¹¹⁶ 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頁263-74。

¹¹⁷ 趙汭：〈黃楚望先生行狀〉，頁379-80。

¹¹⁸ 參看張高評：〈黃澤〈春秋〉書法——《春秋師說》初探〉，載《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579-623。

¹¹⁹ 趙汭：〈黃楚望先生行狀〉，頁372，381。

¹²⁰ 至正二十四年（1364），趙汭已經完成了他平生的重要《春秋》學著作，致函宋濂稱：「今者謝天之靈，幸成其書，而衰瘁益甚。萬一散逸不傳，則是師生兩世虛用苦心，徒廢人事，方來學者以之為戒，無復有堅困窮而盡力於遺經者矣。」見趙汭：〈與宋景濂〉，頁一〇上至一〇下。

其或有異，在我已無疑。……所貴敦實行，無為尚虛辭。」¹²¹ 朱子集周程理學大成，晚年仁熟德至，支離之弊並不足以病朱子，學者之途必以朱子之教為本，貴行尚實，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趙汭強調張、程的門人「經說乃見譏」，顯示他以及元代朱子學者擔心程朱理學昌明後世而經說卻並不完善。由他撰寫的策問，也值得我們稱引：

當是之時〔指二程之時〕，道學雖明，而六經群聖人之書，俱未有定說，乃有轉使人薄之憂……胡文定之傳，為其子仁仲氏〔胡寅〕，而《知言》、《大紀》二書作焉。……其於程氏之學，果能吻合而無間歟？子朱子折衷諸賢之言而集其成，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然四書之註，至於易簣猶改竄未已，將無尚有待於後之君子歟？嘗謂《詩集傳》「後有子雲，必好之矣」，而若不滿於《易本義》者，何歟？《書》屬諸蔡仲默〔蔡沈〕而克有成，其果能繼朱子之志歟？《春秋》嘗屬諸黃直卿〔黃幹〕矣，而卒無所論著，何歟？至其晚年，尤惓惓《禮》、《書》弗置，深以不克見其成書為憂。今其書成矣，其述作之本意亦可得而推見歟？¹²²

程氏義理雖明，但經說不足，而門人胡氏及其後人也未盡合程氏之意，遑論其經說穿鑿附會，不得聖人本義。朱子集諸儒大成，著《四書集注》以顯義理之精，且重視經典的研究，或親自致力，或委之門人。無論在義理和經說上，朱子一直毫不懈怠，不自滿足，直至沒身而止。趙汭的用意無非在於勉勵朱子後學，應力承朱子之志，除體認、發揮義理之學外，更重要的是沿著朱子一路的經說繼續深研。趙汭的注經動力在至正十二年撰寫其師黃澤行狀中顯露無遺：

昔者吾夫子贊《易》、刪《詩》，定《書》，正《禮》、《樂》，修《春秋》，將以為百王大典。……及子朱子出而群言有所折衷，遂定於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其當矣。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為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遂不傳也歟？¹²³

¹²¹ 趙汭：〈送汪子翼赴采石書院山長〉，《東山存稿》，卷一，頁二上至二下。

¹²² 趙汭：〈私試策問〉，載《全元文》，第54冊，頁427。

¹²³ 趙汭：〈黃楚望先生行狀〉，頁380-81。

趙汭認為，朱子於六經上的工作，除了《詩集傳》外，《易經》雖成書卻有待補備，《禮經》更未成書，對《春秋》的看法具指導性卻畢竟沒有著述。更需留意，除了蔡沈（1167–1230）承繼朱子遺志，撰成《書集傳》並得到好評外，¹²⁴朱子的門人弟子對《易》、《禮》、《春秋》，雖有一些補備的工作，但都不夠理想。黃澤主張「六經復古」，但在經學上用功最多便是《易》、《禮》、《春秋》三經。¹²⁵趙汭如此闡發的目的在於說明，其師對於經典的研究和實踐，是繼承朱子及其門人未成之志事。可是，黃澤的著述，一方面散佚而留存較少，另一方面多是為經典研究提供方法性的指導，並沒有完成六經的復古工作，所以趙汭有「其遂不傳也歟」的婉轉感嘆。至正十二年，趙汭已經開始研撰《春秋》學而有所得，這樣的感嘆用意在於顯示，他對《春秋》的研究，不僅是完成其師未成事業的一部份，同時還是繼續完善、補備朱子經說的工作志向。

趙汭熱衷於注經，以至於至正九年，趙汭的交遊蘇天爵敦促他應考，出為世用，也為他所婉拒。¹²⁶事實上，求學結束後，趙汭便一直致力於《春秋》的研究，直至老死於鄉。至正六年，黃澤卒後，趙汭開始擇取黃氏《六經辨識補注》、《翼經罪言》、《經學復古樞要》等有關《春秋》的言說，參以平日所聞，彙編成書，在至正八年成《春秋師說》三卷。¹²⁷當年，趙氏又反覆揣摩《師說》的內容和意旨，出入歷代《春秋》傳注數十百家，集諸說以合於經者，附以己斷，到至正十二年，撰成《春秋集傳》初稿。但所集諸說不能一一合乎聖人經說本意，趙汭悟及「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的古訓，運用屬辭比事的方法考辨《春秋》記載書法的異同，推見聖人「筆削」之義。依著這樣的思路，趙汭對《春秋集傳》進行修改，到至正十七年撰成《春秋集傳》。¹²⁸

¹²⁴ 侯外廬等：《宋明理學史》，頁523–28。

¹²⁵ 按：從〈楚望黃先生行狀〉來看，除《六經補注》、《翼經罪言》，為六經整體而作，黃澤的著述集中在《易》、《禮》和《春秋》。《易》有《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略》、《辯同論》、《易學濫觴》等；《春秋》有《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春秋指要》、《經旨聚略》、《稽古管見》等，另有單篇論說十餘篇；於《易》、《春秋》二經互通上，還有《易春秋全解》；《禮》有《二禮祭祀述略》、《禮經復古正言》，另有單篇論說若干。以上的眾多著述中，僅有《易學濫觴》流傳下來而被清代《四庫全書》收錄。

¹²⁶ 趙汭：〈上蘇參政〉，載《明文海》，卷一八三，頁一上至一下。

¹²⁷ 趙汭：〈春秋師說自序〉，載朱彝尊（著）、張廣慶等（點校）：《經義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第6冊，頁292–93。

¹²⁸ 《春秋集傳》撰寫始於「至正戊子〔八年〕」，完成於至正十七年。見倪尚誼：〈春秋集傳序〉，載《全元文》，第59冊，頁206。但據〈東山趙先生汭行狀〉，趙汭撰成《春秋師說》後，「復因其意，為《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及重改《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可見，至正十二年，趙汭便撰成《春秋集傳》，但因悟及屬辭比事的方法而重改之，到至正十七年修改完成。見詹烜：〈東山趙先生汭行狀〉，頁212。

《春秋集傳》撰成後，使趙汭認識到屬辭比事對研究《春秋》經典如何重要，還令他從中悟及三傳以來各家的得失利弊：《左傳》和杜預《左傳杜注》等書，能得魯史遺法，但不知有筆削之法；《公》、《穀》直至南宋陳傅良的《春秋後傳》等書，有「屬辭遺意」，能得聖人筆削之旨，但忽視甚至不知先以考魯史舊章為前提。¹²⁹ 趙汭認為杜預、陳傅良分別得《左氏》和《公》、《穀》之精，但皆有其失，所以以陳氏之說，附於杜氏之下，去短集長，補其不及，撰成《春秋左氏傳補注》。¹³⁰ 據趙汭的陳述，《春秋左氏傳補注》的撰寫，運用「屬辭比事」之法對杜、陳之說加以擇取和考定，後來成書的《春秋屬辭》中的八篇之目，「由此得其六七」。¹³¹ 可見，《春秋左氏傳補注》撰成早於《春秋屬辭》。《春秋屬辭》共十五卷，分為八篇，卷一至卷七為〈存策書之大體〉第一篇，有筆無削，考訂《春秋》與魯史舊文的關係；卷八、九為〈假筆削以行權〉第二篇，有筆有削以見義；卷十為〈變文以示義〉第三篇，卷十一為〈辯名實之際〉第四篇，卷十二為〈謹內外之辯〉第五篇，卷十三為〈特筆以正名〉第六篇，筆削不能見其義者，所以《春秋》有變文、特筆，而卷十一和卷十二皆是變文的類分；卷十四為〈因日月以明類〉第七篇，考訂春秋日月之法；卷十五為〈辭從主人〉第八篇，即《春秋》依從魯國文辭者。¹³² 〈春秋集傳序〉所載「筆削之義有十」中，存策書之大體即《屬辭》第一篇目，謹名分之辯、謹華夷之辯即《屬辭》第四、五篇目，辭從主人、議而不辭即《屬辭》第八篇目。《春秋左氏傳補注》成書後，大概除了《屬辭》第七篇目未確立外，其他皆定。¹³³ 可見《春秋屬辭》的撰寫，是他研究《春秋》實踐過程中不斷累積、思考的產物。而《春秋屬辭》成書，不晚於至正二十年（1360）。¹³⁴ 此後，趙汭又以《春秋屬辭》的精義對《春秋集傳》進行修補、更正：「《屬辭》是先考定史法，以明聖人筆削之權；《集傳》是推原事情世變，以達聖人經世之用。二書各有所主，互有發明，而後經意始定。」¹³⁵ 至正二十三年（1363），趙汭著筆重訂《集傳》，撰至魯昭公二十七年，因病而卒，後由其門人倪尚誼補續而成。¹³⁶

以上在於考釋趙汭《春秋》學著作的成書經過，足見其積思而悟、反覆求之和不懈努力的情形。他分明以此項事業為終生職志，甚至不顧當時的環境和身體狀況。

¹²⁹ 趙汭：〈春秋集傳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448。

¹³⁰ 趙汭：〈春秋左氏傳補注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420-21。

¹³¹ 趙汭：〈春秋纂述大意〉，載《全元文》，第54冊，《春秋左氏傳補注》條，頁489。

¹³² 趙汭：〈春秋屬辭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418。

¹³³ 趙汭：〈春秋纂述大意〉，《春秋屬辭》條，頁490。

¹³⁴ 至正二十年，休寧商山義塾奉朱元璋政權之命始刻《春秋屬辭》，後因費用不貲中途停工；至正二十四年，當地官員奉命續刻而成。見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書目續編》影印十萬卷樓刊本（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卷九《春秋屬辭》條，程性〈跋〉，頁九上。

¹³⁵ 趙汭：〈春秋纂述大意〉，《春秋集傳》條，頁491。

¹³⁶ 倪尚誼：〈春秋集傳序〉，頁206-7。

至正十二年後，新安戰事不斷，社會極其不穩定。趙汸除協助同邑汪同保護鄉井外，¹³⁷皆專心著書。至正十七年，徽州內附朱元璋，趙汸不應朱元璋政權的羅致，寓居衢州的柯山；至正十九年（1359），居於婺源山中；至正二十二年（1362），才回休寧東山精舍。¹³⁸趙汸避居深山，可以說是對形勢不穩定之前的觀望，但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他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把他一旦悟及如何考求《春秋》聖人本來原意著論成書。至正十九年左右，朱元璋命官員禮羅趙汸至南京。趙汸陳列三條理由加以婉拒：第一，久病纏身；第二，專守一經，無取於「武功經營之日」；第三，一介經生文士，不習當世時務，不足為謀。趙汸疾病纏身確是事實，自謂無才應世卻是藉口。至正九年，趙汸寄函蘇天爵，指陳元代學校教育的弊病及其改進的措施，甚為詳善。¹³⁹至正十五年，元廷徵聘鄭玉，趙汸不主張他出山，但慫恿他建言元廷治國安邦之要，一旦采用施行，則「不仕猶仕」。¹⁴⁰他甚至迫不及待地為鄭玉鋪陳他對時務的看法及彌盜安邦的策略，希望鄭玉有所參考，以致「畎畝之思」。¹⁴¹可見，趙汸特別關心現實政治，指陳時務往往有獨到之見，無怪乎其門人在〈行狀〉中稱許他有「經濟之才」。¹⁴²他謝絕朱元璋的徵聘，主要原因就在於完成已見進展的《春秋》學研究，所以他附上所撰〈黃楚望先生行狀〉和〈春秋集傳序〉，並謂：「所以見其早得虛譽於當時者，以此而以。其久病廢不能脫藁，恐有遺恨於身後者，亦在於此。」¹⁴³趙汸無非希望當政者能讓他安心著述。至正二十一年（1361），趙汸客居婺源。朱元璋的部下王克恭，聽說他病治不效，延請浙東的名醫給他治理。醫士要求他「所謂著書作文者，一切屏去勿為」，專心養病，趙汸卻謂：

初，余以久病，捐書絕學。而《春秋》疑義，一旦忽然貫通，錯縱綜橫，自成義類，蓋不加一辭，而諸儒千載之疑，冰解凍釋，悉就條理，是豈余所欲言哉？殆若有天意焉。不然，何其易簡之至，而大經大法，煥然以明也。然其說雖定，而書未易成，凡吾所以深憂吾疾者，此也。¹⁴⁴

在趙汸看來，他已經貫通《春秋》之學，所擔心的是因疾病而影響著作，所期望的是病治而論著克成。

¹³⁷ 汪仲魯：〈東山存稿原序〉，載趙汸：《東山存稿》卷首，頁二上。

¹³⁸ 詹烜：〈東山趙生汸行狀〉，頁210-11。

¹³⁹ 趙汸：〈上蘇參政〉，頁一上至六上。

¹⁴⁰ 趙汸：〈賀鄭師山先生書〉，載《全元文》，第54冊，頁411-12。按：趙汸在這封信函中，並不同意鄭玉出山，但建議鄭玉向朝廷建言，若言論能被采用施行，則「不仕猶仕」。

¹⁴¹ 趙汸：〈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293-96。

¹⁴² 詹烜：〈東山趙先生汸行狀〉，頁210。

¹⁴³ 趙汸：〈答蔡參政〉，載《全元文》，第54冊，頁473。

¹⁴⁴ 趙汸：〈送唐思恭歸華序〉，載《全元文》，第54冊，頁307。

趙汭對《春秋》學的鑽研花費巨大心力，而當他主要的《春秋》學著作大概寫就時，又積極請士友校正，並熱心於論著的刊刻。¹⁴⁵他給朱升的信中稱：

今汭所纂述，却祇是屬辭比事法，其間異同詳略，觸類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為一切之說以自欺，而謾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而序文具見微意，明不可與《釋例》、《纂例》等書同論也。¹⁴⁶

朱熹倡導先實求經之本義後再推衍義理，所以於《春秋》各家經解皆有不滿。黃澤決意為之的經學「復古」，是朱子本義之學的張顯。趙汭承黃澤復古之學，悟及通過排比、分析和綜合《春秋》經文的「屬辭比事」方法來突顯孔子的書法，所以他自詡其與先儒以凡例解經、或纂釋各家之說以說經殊為不同。可見他不僅對其《春秋》著述高自期許，甚至認為已經完成了《春秋》經的復古工作。

綜上所述，趙汭求學結束後，為完成其師經學復古的遺志而一直奮力於《春秋》研究，沒有受戰亂而終止，沒有因久病而中輟，也沒有應朱元璋之徵聘而出為世用。在趙汭看來，他和其師黃澤是直承朱子之志的，而其師經學復古的理念和努力以及他對《春秋》經典復古的實踐，都是改變程朱經說不足的現狀而有功於朱子的事業。

結 論

十四世紀儒者趙汭之所以為足述的思想人物，在於他有如本文所論述的與眾不同的遊學經歷、思想主張和經典研究，以及其折射出的元末思想界面向和異動的情形。知人論世，因時道人。人的思想特色和行事，不僅與他的學問淵源和學術取向有關，更與他所處身的時代和學術環境關係密切。以趙汭的個案來看，他生於朱子之鄉，受朱子學者之教，弱冠之後卻離開家鄉奔走於江西、浙江等地，拜師交友，原因在於徽州朱子學因為過多闡發、補備朱子之言，不僅使朱子學的精義不明，道學障而不顯，而且令後學無所適從，甚者以辨析文義便是致知之學。而遊學於浙江、江西等地，為趙汭思想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夏溥、黃澤和傅吳澄「尊德性」之學的虞集等，令他對朱子成說好疑深思，不以敷衍朱子文義為學，而追求「切於己」的自得之學。求學歸後，趙汭對徽州學者治學風氣和取向多有批評和救正，有意於學者為學次序、要領的申說，而他揭櫫「反己」、「為己」之學，主張學貴為己，反身而求，更是因弊救病之論。

¹⁴⁵ 趙汭：〈與梁按察〉，載《全元文》，第54冊，頁470。

¹⁴⁶ 趙汭：〈與朱風林先生赴允升學正書〉，頁466。

趙汭認為程朱義理已明，「無復餘蘊」，學貴澄心默坐，涵養本原，然後於心上體認程朱之理，反己而求。他的思想個性和主張並非是承接陸學的結果，或簡單認為是以陸學來補朱學之弊。原因在於，他平生治學的取向和依歸是朱子學的，對陸學自言「不足言之」，他治學的實踐更顯示他忠實而善承朱子之志。以趙汭二十七歲求學於虞集時所作之〈對問江右六君子策〉而言，也始終偏向朱子學，甚至有代朱子立言辯護的意味，認為陸學既不易知又不易入，學當學朱子之讀書窮理。可見他雖承認陸學是聖賢之學，卻不主張取效其學，這種「容」陸而「取」朱的思想傾向在元末也不是孤立的現象。他提出的「反己」、「為己」之學，主張學貴求諸心，反諸己，不僅為以講熟程朱經訓、辨識文義便是為學的學風開方，還是他對程朱理學傳承授受真正所在的反思所致。¹⁴⁷

實際上，元人不僅尊程朱之說，重視踐履程朱之學，或是如趙汭所強調的於心上體悟程朱義理，他們還特別用心於六經的研究成說，而《易》、《春秋》更是元人傾心所在。¹⁴⁸趙汭早年有意研究《易》和《春秋》，晚年在《春秋》經研究完畢後又開始《易》的探析，他的老師黃澤雖提倡六經復古而尤致力於《春秋》、《易》二經，便是例證。元人對《易》、《春秋》為何如此用力，其中的原因非本文的研究所能解決。就趙汭和黃澤的個案來看，補備程朱經說不足的一面自當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這也是他們注經的動力源泉。具體而言，趙汭清楚地認識到程朱義理雖明而經說不足為式、仍有待補備的事實，承繼其師黃澤六經復古之學，以求經之本義和實義為歸。他和其師黃澤不僅善承朱子解經的精神所在，而且以完善、補備朱子經說為職志。趙汭出入《春秋》百家傳注，積思而悟以求一旦豁然，終以屬辭比事的方法排比、分析《春秋》經文以顯聖人筆削之書法，無疑是他治《春秋》的最大特色和貢獻。

¹⁴⁷ 趙汭在求學階段不滿於誦習程朱經訓義理為已足，而是反求程朱為學之要和相授受的真諦所在。見虞集：〈東山精舍記〉，頁53。見諸〈東山趙先生汭行狀〉所載，趙汭認為程頤所謂「明諸心」、程顥所謂的「靜坐」，以及從羅從彥、李侗再至朱子的「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而「終知天下之大本」之學，便是一貫相承的為學之方和要領。

¹⁴⁸ 劉明宗〈元代春秋學撰著分類考述〉（《書目季刊》第27卷第1期〔1993年6月〕，頁28-56）統計元代治《春秋》家共132人，著述205種；黃沛榮〈元代《易》學平議〉（載《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159-94）統計，元代《易》學著述達240種。

The Tours, Thought and Course of Learning of the Late-Yuan Confucian Scholar Zhao Pang

(A Summary)

Wu Zhao Feng

One's ideas and acts are not only influenced by his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scholarly orientation, but also by the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he is exposed. 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Zhao Pang 趙沔 (1319–1369), a prominent Confucian scholar of Huizhou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focus on his thoughts of fusion of Zhu Xi 朱熹 (1130–1200) and Lu Jiuyuan 陸九淵 (1139–1193), as well a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unqiu* 春秋. Focusing on Zhao's studying tours, his thought and scholarly lif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thought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late Yuan Zhu Xi School of Huizhou 徽州朱子學,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devotion to the study of *Chunqiu* in the Yuan dynasty. It shows that Zhao left his birthplace Huizhou in his youth to the provinces Jiangxi and Zhejiang in search of competent classical teachers because the Zhu Xi School which once flourished in Huizhou was declining. His encounters enabled him to reflect and criticiz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intellectual trends of Huizhou, and, after having completed his study tours, he advocated the doctrine of *weiji* 為己 (learning for one's own self) and *fanji* 反己 (reflecting upon one's own self) as a prescrip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deficiencies of the locality. It also shows that Zhao, being a staunch admirer of Zhu Xi throughout his life, actually argued with Lu Jiuyuan in favour of Zhu Xi in the essay "Duiwen Jiangyou Liu junzi ce" 對問江右六君子策, which researchers usually consider as evidence of his intention to fuse Zhu Xi and Lu Jiuyuan into one thought. Finally, the paper shows that Zhao and his teacher Huang Ze 黃澤 (1259–1346), the eminent *Chunqiu* scholar, not only had followed Zhu Xi's methods in researching the Classics, but also kept perfecting the deficiencies of Zhu Xi's classical scholarship, especially that on *Chunqiu*, thereby confirming the importance of Zhu Xi's learning.

關鍵詞：趙沔 遊學 徽州朱子學 為己、反己之學 〈對問江右六君子策〉《春秋》學

Keywords: Zhao Pang, studying tours, Zhu Xi School of Huizhou, doctrines of *weiji* and *fanji*, "Duiwen Jiangyou Liu junzi ce," the study of *Chunqiu*